

从边民互市贸易看沿边开放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边民通商互市历史悠久。开展边民互市贸易,能有效促进兴边富民,巩固与邻国的合作交流

杨海东

沿边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边民互市贸易是促进边民增收的有效渠道,是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特殊举措,是推进“一带一路”、巩固与邻国合作交流的经贸方式。中缅两国山水相连,世代比邻而居,边民通商互市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打通了贯穿川滇滇印的“金银大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中缅边民互市贸易发展迅速,彰显了中缅沿边开放发展的磅礴活力和广阔潜质。



孟定清水河口岸。

瑞丽口岸。 本报通讯员 张仁韬 摄

互市金额上限

从“5元为限”到“8000元为限”

边民互市贸易方式灵活,有利于提高我国和周边国家边境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但边民互市贸易实践中,往往存在走私、偷漏税等问题。为此,政府采用限制贸易金额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管理,金额上限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贸易需求量的增长而不断调整,从互市金额上限调整中,我们可窥探出双边贸易的变化发展。

1954年4月,云南省颁布《云南省边区对外小额贸易管理及税收征收办法》,其中规定边民互市金额上限每人每天为5元人民币。1996年1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边民互市金额上限提升至每人每天1000元人民币。1998年11月,对外经贸部和海关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发展边境地区经济贸易发展问题的批复》规定,自2008年11月1日起将边民互市进口的生活用品免税额度提高到每人每日人民币8000元。

从1954年到2008年,云南边民互市上限金额从5元调整到8000元,50余年中实现了千余倍的增长。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云南应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持续用好用活边民互市8000元内免税的利好政策,调动边民参与互市贸易的积极性。

互市商品

从“卖农副产品,买工业品”到“买农副产品,卖工业品”

边民互市贸易是边境地区的边民为实现互通有无、调节余缺而进行商品交换的一种特殊贸易形式。随着中缅两国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我国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推进,我国与缅甸边民互市商品类别也在不断演变。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工业品生产力有限,边民互市贸易以“卖农副产品,买工业品”为主。1974年9月,中共德宏州委制定并实施《关于德宏边民互市管理规定》,指出边民互市产品仅限于农副产品、小手工业品、蔬菜、水果和豆类,工业品不得参与互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升,我国生产制造的工业品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边民互市贸易的商品则变为“买农副产品,卖工业品”。1996年,中国向缅甸购入的产品有豆类、玉米、芝麻、高粱、蔬菜、辣椒等农产品,而对外销售的商品是日用百货、装饰材料、五金配件、文体用品、交通配件、农机配件、纺织服装、化肥农药和粮食制品等。

中国在边民互市贸易中从“卖农副产品,买工业品”到“买农副产品,卖工业品”的演变,充分彰显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历史巨变。近年来,中缅两国合作不断深化,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市场潜力广阔。我们要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创新机制,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发展。

互市场地

从“狭窄小街”到“繁荣大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缅边民互市贸易主要在中国边境地区的一些集镇进行,交易场地狭小,摊贩零星。比如,1952年,瑞丽市勐卯街道的在市摊贩有40个左右,当地经商者仅6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中缅边民互市规模也在逐渐扩大。1985年,德宏州根据中央“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及云南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决定全方位开放,将全州5县1市作为互市市场,全州边境贸易得到快速发展。1981年至1990年期间,瑞丽、畹町的边民互市贸易非常活跃,每天光临市场的顾客达万人。当时,瑞丽、畹町、芒市、盈江、章凤等,从名不见经传的地名成为热门话题,“到瑞丽去”“到姐告去”成为人们的目光指向。2010年,云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云南省边民互市贸易场所管理试点工作方案》《云南省边民互市贸易场所管理暂行规定》,根据文件精神,瑞丽、畹町、陇川和盈江等地建设了集交易、联检和仓储等为一体的边民互市贸易交易市场。截至2023年,德宏州建成4个边民互市贸易交易市场,年均参与边民互市贸易达13万余人。

沿边地区对外是“海外市场”,对内是“国内市场”,在大开放发展中地位和作用巨大。云南应发挥好区位优势,紧抓东部产业转移和沿边产业园区建设等契机,强化要素保障,做实政策支撑,做优政务服务,努力打造沿边开放新高地。

互市总额

从“亿元”到“几十亿元”

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与缅甸北部的克钦邦、掸邦接壤。中缅边境口岸数量众多,在中国一侧分布有瑞丽、畹町、孟定清水河、腾冲猴桥和打洛5个国家一类口岸,盈江、章凤、片马、南伞等6个国家二类口岸;缅甸一侧分布有木姐、九谷、清水河、甘拜地、果敢、雷基等口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缅边民互市贸易蓬勃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发展更加迅速。1997年,德宏州边民互市贸易额为1.32亿元,到2023年达47.9亿元。

沿边地区的“边”是最大发展优势。云南应充分挖掘优势潜力,持续深化口岸经济、园区经济和资源经济协同发展,探索“边民互市+落地加工”“互联网+边民互市”“互市贸易+合作社(互助组)”等发展模式,实现内外联动,助力兴边富民。

【作者单位:中共德宏州委党校;本文系2024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社会智库项目“云南德宏沿边产业园区建设调查研究”课题(SHZK2024315)阶段性成果】

红色云岭 德韵流芳

——寻访昆明朱德旧居纪念馆

杨玲玲

仲夏时节,雨后的清晨透着丝丝清凉,沿着昆明翠湖北路步行至华山西路五华山水晶宫红花巷4号和小梅园巷3号,这里是朱德同志亲自规划设计的四合院旧居——洁园。朱德同志总是说:“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永远不会忘记云南。”在这里,他确立了初心,完成了人生重大转折。

云南是朱德同志一生的光辉起点。他以“志士恨无旁,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的誓言,于1909年春离开四川老家来到昆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加入新军,开始了军旅生涯,成为辛亥斗士、护国名将。1921年,朱德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处长等职时,曾居住于昆明水晶宫红花巷4号、小梅园巷3号宅院。在这里,他告别了滇军,结束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历程,开始了共产主义的伟大革命历程。

来到昆明朱德旧居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新建的红色文化小广场,红花巷4号是传统的中式土木结构四合院,小梅园巷3号是中西式砖木结构建筑。“幽兰空奕待冬开,绿叶青葱映画台。初放素英殊露坠,香盈十步出庭来。”朱德同志一生钟爱兰花,在院里种植了梅、兰、竹、菊四君子寄托风骨,将居所起名为“洁园”,以明洁身自重之志。院子前后有花园、假山、池塘、草亭、小桥、石径,清新雅致、宁静祥和。1987年,昆明朱德旧居纪念馆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列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5年云南

省启动修缮工作,2021年命名为云南省廉政教育基地。

在纪念馆的一层陈列室,有《朱德在云南》专题展览,设“投笔从戎到昆明”“革命学习在讲武”“辛亥革命上战场”“护国名将震川南”“洁园忧思”“长征过云南”“视察云南”7个部分内容,以图片和文字展示了朱德同志在云南求学和参加辛亥革命重九起义、护国战争等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沿着四合院来到二楼,这里正在举办《红色云岭 德韵流芳——朱德廉政文化主题展》,展览清晰地记录了朱德同志清正廉洁、立德

树人、勤俭持家的光荣事迹,生动再现了他无限忠诚、光明磊落的坚强党性和清廉高尚的思想情操。

追忆朱德同志波澜壮阔的光辉一生,其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突出贡献同样彪炳史册。他是中央纪委第一任书记,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前瞻性的思想和论述。1951年4月,在党的全国纪律检查工作干部会议上,朱德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更加重视纪律检查工作,并经常检查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予以具体指



昆明朱德旧居。

学士风骨映百年 见贤思齐励今朝

何耀华: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的开拓者

徐正银



何耀华(1937—),祖籍四川宜宾,生于云南开远。我国著名历史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他从事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彝学、藏学、云南史学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60余年,著作等身,成果卓著。何耀华以“干实事,实干事,立足创新”为治学座右铭,以“治史为民”的理念为指导,不断追求卓越,为促进西南地区的民族团结和谐,增进国际学术交流和文化理解作出了应有贡献。

1957年,何耀华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就读本科,开始从事中国民族史的研究。1962年,继续在云南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民族史硕士研究生,师从方国瑜。在读期间,他接触到了彝族文献资料,并开始对彝族社会历史进行系统研究。196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工作了22年。1987年,何耀华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任党组成员、副院长,1991年任党组书记、院长,直至2003年退休。他曾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云南省劳动模范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何耀华通过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相继出版了《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武定凤氏本末笺证》《吐蕃史论》等个人专著,主持或参与了《云南通史》《中国彝族大百科全书》《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等书籍的编撰工作。他结合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对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梳理,多角度、多层次地考察了西南地区的历史变迁和各民族关系,揭示了西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理解和解决西南地区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何耀华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民族学,又借鉴和吸收了国外先进的历史民族学知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他不仅关注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特殊性,还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共性。1988年8月至1989年4月,何耀华被聘为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客座教授,以及名古屋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东京东洋文库客座教授。1992年,

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树仁学院客座教授。1993年,何耀华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讲学,任国际山地协会中心组成员。1993年至2015年,何耀华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民族问题研究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地方志协会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委员、评奖委员会委员。1997年,应法国外交部邀请,何耀华赴法国尼斯大学、普罗旺斯大学讲学。

何耀华是彝族社会历史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他对彝族的起源、分布、迁徙、分支、家支制度、工合经济、原始宗教、民间文学等方面有详细的考察和论述,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田野调查研究,发表了《论凉山彝族的家支制度》《凉山彝族与汉族的历史关系》等论文,主编或参编了《中国彝族大百科全书》《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等重要著作,为彝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见解。他撰写了《阿诗玛》《阿诗玛与阿黑》等,为展示彝族文学艺术提供了生动范例。

何耀华的学术思想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他的作品不仅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纂的“中国社会科学百部名著”“中国社会科学百部精品”等丛书,也被收入日本东京大学编纂的“中国文化人类学文献解题”等丛书。

2003年,何耀华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他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还积极参与了多项国家级和省级重大课题的研究和指导,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赴日本、美国、法国等地进行访问或讲学,与国际同行分享他的学术成果和经验,同各地历史民族学界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关心和支持青年学者成长,为云南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历史民族学人才。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和少英:潜心笃志的民族学家

黄彩文



和少英(1954—),云南丽江人。主要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跨境民族地区民间信仰等方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和少英多次到欧美名校与著名科研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具有开阔的海内外学术视野、深厚的本土文化经验,研究领域广阔,涵盖民族志、比较民族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等。他在学界最早倡导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提出了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本体论”观点,推动了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创新。

和少英的建树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教育环境,他未满6岁就被送进学校念小学。高中毕业后,于1973年到丽江县石鼓公社一个傈僳族村寨当知青,一边担任生产队的会计,一边担任丽江县第四中学的代课老师,成为“高中毕业教高中”的先例,后被首批推荐到丽江地区商务局车队当汽车修理工,次年被抽调到局机关,兼任局团委书记。

1977年,和少英考入云南民族学院,1983年考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1986年毕业并获法学硕士学位。1987年,考取南京大学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继续攻读。负责欧美期间,和少英先后担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等学校的高级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赴俄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开展学术交流,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学者。2001年起,他被云南大学聘任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与民族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迄今已达20余载。

和少英曾任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是国家社科基金会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2015年,被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1世纪初,和少英就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展合作,与时任所长的马戎共同领衔申报“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被列为云南省与北京大学共建的“省院省校合作项目”,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培养

了一大批民族学优秀骨干人才。他积极开展与诸多海内外一流高校的合作交流,尤其是他领衔申报获批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为云南民族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数十年来,和少英凭着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学术积淀,潜心开展科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他主持完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各民族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等10余项国际大型合作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了《人类学/民族学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生存在全球化时代》(英文版)、《云南研究》(英文版)、《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人类学一百年》《逝者的庆典》《纳西族文化史》《重新把握人类学》等著、译(含合著)作品。主持了“云南民族文化丛书”“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大型丛书的编撰工作。他的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励。

和少英始终坚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职业操守和学术道德,长期关注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积极探索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有效途径,身体力行推动民族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离开故乡丽江,远赴海内外高校求学、教书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已近五十载的和少英,始终心系故乡,他曾多次应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之邀,投入丽江三项“世界遗产”桂冠的申报工作,尤其在推动《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和少英还积极推进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着力培养民族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人才。2022年,和少英应邀担任丽江文化旅游学院院长,回归家乡,服务桑梓。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